

关注

面对生成式影像的普及与挑战——

摄影的核心仍是“客观性”与“在场性”

□ 阳丽君

“AI”“人工智能”这几年绝对属于高频热词,不仅在于“智能化”所引发的关于科技与伦理的学术探讨,更在于“价廉物美”的快捷应用所引起的相关行业的“地震”与“海啸”,还在于它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渗透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于摄影而言,生成式影像甫一诞生,便注定成为摄影发展的新契机或新方向。

如果说手机摄影的普及让摄影进入“人人拍、拍人人”的大众传播新时代,那生成式影像则可以叫作“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现实。手机拍摄与传统相机拍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是讲究光影、构图、意境,需要器材掌控者的主体思维。但“文生图”不一样,它彻底改变了图像的生产方式,你不需要成像工具,也不需要跋山涉水,只要对着手机或电脑里的相关软件说几句话,就能生成你想要的图片,各种风格都有,深切满足了普通大众对美和艺术的追求,而且不需要太多日积月累的专业训练就能达成。最初的AI生成式影像塑料感还很强,一些细节“糟点”满满。随着AI的迅速迭代更新,许多缺陷被修复,生成式影像以假乱真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给影像鉴定带来了极大的难处,也让人们越来越难信任影像的真实性。“有图有真相”这5个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摄影客观性的确切注解。那到今天,“有图”还代表“有真相”吗?当声音和动作都可以AI生成,重申摄影的客观纪录价值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摄影的“客观性”和纪录价值

自1839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术问世,宣告了摄影术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看世界的方式,人类也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对客观世界进行真实记录和再现的手段。摄影术(包括摄像)诞生之前,能够记录或承载历史的载体,以语言文字为主,历史遗迹、绘画、音乐、习俗为辅。摄影术诞生之后,在历史遗迹之外,又多了一种也许称得上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工具,以及绘画之外另一种叙事记录工具。记录工具的进步,必然会改变历史的叙事方式,这就是摄影的纪录价值之所在。

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身边的环境和琐碎事件习以为常,或迫于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而无暇记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一组例行公事的工作照、一张日常生活记录照、一张随手拍摄的街边影像,在某个时候会突然跳出来,成为触动我们灵魂的历史记录,产生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影响,从而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心中难免不发出“啊,原来是这样”的慨叹,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

这种慨叹,来源于影像记录的真实性和历史认知的“复归性”。客观性是摄影的本质属性和意义所在,是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独一无二的特性。语言文字会有主观性、多义性,绘画具有再创造性,遗迹会湮灭不可考,文化习俗不断传承演变,唯有摄影能够忠实记录现实。英国摄影家、评论家格里·巴杰说过,“只要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任何一张照片必然能够捕捉到具有时代魅力的闪光点,无论摄影师当初的意图如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赋予摄影以重大意义的,除了现实的复刻,还有时间的发酵。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师,对摄影也是如此。人都有探求历史真相及其意义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认知阶段、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同时刻对真实历史的回顾,都会赋予真实历史以丰富的、复杂化的意义和内涵,这就是历史认知的复归性。摄影术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记录方式一道,为这种复归提供了现实基础。

当你拿起相机,面对世界与现实生活与现实的真实,“咔嚓”一下,这一瞬间被定格,相机镜头前现实的一瞬间便已成为历史。如果这一瞬间记录的是真实的世界,那这真实的瞬间便是真实的至少是相对真实或者是瞬间真实的历史。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它立足于现实的思索;所有历史都不是当代史,因为它是由许多创造历史的人民的微观历史组成。摄影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的以影像的形式记录的微观历史。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影像如何书写历史,历史又如何影响影像,在影像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诚然,影像有其客观性、鲜明性、生动性、直观性等优势,也有其虚伪性、片段性、不可言说性等特点,既有一图胜千言,也有一图需千言。影像与文字相辅相成,已成为新时代书写历史的重要手段。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批摄影家对抗战老兵及二战遗存进行了拍摄;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界以影像的方式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回顾;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摄影界掀起了对历史影像梳理和研究的热潮;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红色影像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成为热点。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女航天员刘洋出征(2012年)

岱天荣 摄



天坛之光(2025年) 石永亭 摄



亚运记忆(2023年) 庄跃成 摄



拍与自拍(2024年) 阳丽君 摄

90周年,伴随着这些重大历史节点,大量老照片和纪实影像进入业界和公众视野,而“影像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影像”则交错着引发人们对影像与时间、与历史、与记忆的进一步探究。

百年的奋斗历程留下了大量真切的影像记录。摄影家们记录下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祖国发展的方方面面,用最真实、直观、形象的方式见证着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与光辉岁月。这些作品有着明确的真实性,切切实实地记录、明明白白地展示;也有着鲜明的典型性,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映照一个群体。这些照片内容丰富、细节生动、信息量大,包含了某个特定时代的独特信息。

纪录价值无疑是摄影的本质价值之一。小到个人记忆、家族纪念,大到国家重大事件、人类发展历史,都离不开摄影的真实记录和客观表达。

摄影的“在场性”和具身体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在商业和艺术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显著节约了不少人力物力。用AI辅助艺术创作、用AI处理图片,也成为摄影人的日常选择之一。在最初的技术焦虑与争议过后,摄影界已普遍接受AI成为摄影创作的辅助手段,将其纳入摄影门类的一个分支。然而,在严肃摄影领域,如纪实摄影、新闻摄影,业内仍严格按照不得增删、合成等既往的专业要求,并增加了不得使用AI等规定。

AI图像生成消解了主观创造、具身体验和个体的在场感,而这些正是摄影的独特魅力。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摄影除了瞬间性、偶然性、客观性等特质外,在场性是其容易被忽略的一种特质。它不仅体现在摄影人对光影的追逐中,更体现在摄影人用生命探索世界、叩问真相的征途中。在激烈的战场上,摄影人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中左冲右突,他们视死如归,只为能记录下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深邃。在高高的雪山上,摄影人背着厚重的器材,冒着严寒和风雪,只为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画面。在绝顶、在洞穴、在深海、在极地,在众人迹罕至的地方,都可以看见摄影人的身影,他们听从远方的召唤,不断

挑战自我,坚定不移地向自然的最深处出发,与自然相遇、相通,生命也在一次次的跋涉和险象环生中升华。只有登绝顶,方知山之高;只有下深海,方觉海之秘。只有经历饥饿,方明食物之可贵;只有历经四季,方感岁月之美。人的身体在大自然中所经历的感受、感悟、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上的触动、震撼,最后都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成为一幅幅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最坚实的底色。在想象中的画面越来越容易被视觉化的今天,人们对原始生态的热爱反而被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拍野生动物的行列,加入到前往高山大川的跋涉之途。

不单在自然之间,人文领域的相遇与在场也曾诞生一张张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巴西摄影家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曾多次深入巴西金矿的千米井下,在45摄氏度高温与随时塌方的威胁中,拍摄密密麻麻的金矿工人的辛勤劳作;中国摄影家朱宪民拍了60年的黄河流域,始终把镜头对准最广大的普通人,记录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烟火日常,用质朴影像定格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在图片易得的当下,与人交流、与人沟通,拍摄普通人的感人故事,从中获得的具体体验,远非坐在家对着手机下达指令可比。

虽然AI可以轻易地生成一张照片,轻易地进行变装或是背景的切换,但人们并不满足于此。这两年火热的“旅拍”——到一个景点就穿上符合该地域文化特色的服装,进行实景拍摄,成为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旅拍的火热,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从摄影术的发展逻辑来看,其与摄影术诞生初期摄影的功能和特征一脉相承。只不过,从照相馆里的场景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环境,不变的是妆造,变化的是空间,满足的是人们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情境下的自我想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此外,“新中式”作为一种新的美学时尚,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文化消费与审美潮流。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各大旅游景点穿着各种古装的男女在其中穿行。这是旅游的新业态,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一种新趋势。究其原因上的深层原因,不正是体现了对具身体验和真实场景的内在追求?

在算法与AI主导的视觉生产中,人的在场与具身体验是摄影的灵魂与底线。AI时代的摄影,或许不再执着于“拍得像”“拍得美”,而是转向彰显“我曾真实地活过、看过、感受过”的人的存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行走于大街小巷、高山流水之间的拍摄,本质上是人们从碎片化的数字世界中抽身,回归生活、回归当下、回归身体、回归生命本身的过程。在数字技术与AI影像不断重构视觉生产的当下,重返摄影的在场性与具身体验,不仅是对摄影本体精神的回归,更是对人的感知、存在价值与影像真实意义的重新确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改编自作家朱秀海的同名长篇小说,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编排,表演艺术家王洪玲领衔主演赵秀英。原著小说以解放战争支前英雄赵秀英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书写她在战争年代的家国大义与信仰坚守。小说的精神内核与人物气质同河北梆子可谓天然适配。梆子高亢激越、苍凉厚重,无论生旦,慷慨悲壮,声声入耳,表演往往自带英雄气概,与表现战争题材的史诗感、英雄气概自然契合。小说聚焦北方革命历史,与河北梆子的地域文化亦根脉相承。因此,将小说改编为河北梆子剧目既彰显原著精神力量,又兼具艺术感染力,是一次成功且值得关注的文学转化。

小说《远去的白马》约32万字,给戏曲提供了磅礴跌宕的故事内容与血肉丰满的众多人物形象。剧本改编在大胆提取原作素材的同时保留了“白马”意象并进行舞台串联,高度浓缩了主人公的传奇人生,聚焦其战斗中的婚恋与革命历程,悲悯其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的爱情,歌颂其隐忍坚韧、大义当先的宽广心胸。文学之于戏曲、小说之于河北梆子,经过创造性转化,二者相得益彰。小说素材庞杂、人物众多、叙事灵活、多线并行,戏曲改编受限于舞台,故“因人设戏”,依凭舞台表演聚焦精神风骨,抓住了独属于剧种的形式之美。依托“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步”,因势利导转换叙事角度,从第三方的他者全知转而聚焦主角赵秀英第一人称“我”之视角,深入主人公内心,以“我”之眼观看,以“我”之心体认,舞台收束线索、局限视野的同时提炼并浓缩了表达,剧作抒情性更加浓烈,从“我”出发的舞台表演性也得以极大提升。

小说中的几十年光景如何压缩为舞台上的两个多小时?该剧截取了主人公传奇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进行精心编织:第一场“洞房”,农家少女兴奋待嫁;第二场“险象”,妇女干部果敢援军;第三场“断肠”,新婚妻子却痛失所爱;第四场“前行”,义无反顾随军;第五场“夕照”,沐浴之光却再失所爱;第六场“白马”为引,功成退隐。剧作将主人公从抗战时期到晚年的人生历程浓缩为几场重头戏,爱情婚恋与援军助阵组织密衷,时空转换的倒叙与顺叙穿插交替,“前情”“后事”虽跳跃迂回,然故事逻辑简洁有序,舞台节奏依然流畅自然。

赵秀英的形象是全剧的戏核与戏魂。剧作与舞台层层“剥茧”,将战时赵秀英身为妻子、母亲、大姐、媳妇和不在编战士的实在行动与多重心理进行了细致的舞台化,在大开大阖的火热战斗与细腻含蓄的婚恋情事中传递情感,表达敬意。她刚柔并济、无私奉献、坚守承诺的革命女性特质,在其错嫁误身、渡海支前、战地救护、为烈士母亲养老送终等事件里或明或暗地加以浓缩呈现,而小说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如赵秀英对爱情的渴望、对命运的无奈等则通通转化为细腻入微的核心唱段加以表达,将文字描写转化成河北梆子最擅长的“以声传情”。

舞台上,王洪玲将主人公作为革命女性两次爱而不得的悲伤与隐忍,以及她为家为国、为战友为邻里、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战斗与牺牲都做了艺术化的转喻,为河北梆子舞台增添了一位立体化的普通人英雄形象。她调动程式艺术,以层次分明的细节表演吸引观众,尤其注重表现人物年龄、心理演变的差异化与“过程性”,从农家少女、村长、支前队长、编外战士再到“遗孀”,她层次丰富的表演为剧目贡献了相对完整的人物“成长”与运动变化弧度。

与文字构筑的纯想象世界不同,该剧精心构建了虚实相生的具象化舞台。背景远山苍茫,前景空心与实心两个“红镜框”错落又交叠,大、小、远、近、内、外空间灵动,在被浓缩又被强化的场域里,在分合运动的两块“实战”小平台上,在交错纵横的几处点睛“红线”之下,在红喜堂白灵堂的转换之间,王洪玲层层铺展的唱段处理和因人因境因情设置的艺术化的细节表演,以及在关键情节与重要情感爆发点上的恣意挥洒等,都将文学的想象进行了精彩的具象呈现。

全剧唱腔、音乐设计用心用情,乐队托腔保调丝丝合缝,演员嗓音扎实、表演细腻,精彩唱段赢得阵阵喝彩。围绕大女主,整个演出团队也贡献了较为丰满的人物群像,如37团官兵、支前队长等角色。“白马英雄”刘抗敌与欧阳政委是赵秀英爱情与理想的寄托,他们服务主线冲突,也共同汇入革命的洪流,铺陈出人民创造历史的主旨,同时为剧作渲染出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底色。

小说开篇白马,白马是原作的重要情节线索与意象贯穿。河北梆子顺势将其拎出来重新赋形,“白马”也成为了舞台聚光的点。戏曲舞台上,以人扮“偶”,并不少见,然该剧舞台上的“白马”在叙事串联、结构情节之外,还保留了小说赋予的诗意与象征意味。较之小说,又以戏曲的变形幻化了既真实又虚幻的“白马”,捕捉并强化了其内在的意象性。剧中的“白马”武生应工,与两位男主角相配,主体俊扮,胸门稍饰象形,戴加长白色甩发,持白色拂尘,披缀白色斗篷,一身行头稍做“改编”,形神俱佳的几匹“白马”即立当前。扬鞭趟马等戏曲技巧也得以全程运用:大圆场疾走,云带背后,似马鬃猎猎,迎风飞驰;摆腿、滑叉、甩发、旋子、跳叉、串翻身、卧鱼儿等技巧又似“白马”在群山之间的奋战颠簸。

与小说高度相契的是,该剧也以白马为序,言志收尾。它既是爱人的坐骑与化身,也承载着革命理想与信念,既寄托赵秀英的个人情感,也象征民族精神。在念白与唱段中反复出现的白马,凝聚着牺牲精神与人性光辉,具象与诗意,成为全剧的精神符号。

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母体,该剧基于文学IP进行改编,自觉锚定戏曲舞台之特性,以凝练细腻的情节取舍、形象诗意的意象设置,以及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构建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戏曲表演世界。剧作以独具梆子特色的艺术呈现实现了对文学内涵的直观转化,引领观众完成了一次跨越文学、戏曲的艺术对话与探索。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创作和研究中心研究员)



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剧照

将文学的想象化作精彩的舞台呈现

□ 彭维